

革命现实主义的胜利

——评刘心武《班主任》等六篇短篇小说

吴高福

刘心武同志继《班主任》(《人民文学》一九七七年第十一期)以后,又陆续发表了《没有讲完的课》(《人民文学》一九七八年第四期)、《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北京文艺》一九七八年第五期)、《爱情的位置》(文艺丛书《十月》一九七八年第一期)、《面对着祖国大地》、《鸭绿江》(一九七八年第八期)、《醒来吧,弟弟》(《中国青年》一九七八年第二期)等几个短篇,作者完全摒弃了“四人帮”的“帮规”、“帮法”,遵循从生活出发的原则,在这六个短篇中,塑造了真实可信的时代英雄,歌颂、赞美了社会主义光明,并大胆地触及了现实,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和对生活的深邃思考,提出了千百万人关心的社会问题,无情地暴露和有力地批判了“四人帮”毒害青年一代、腐蚀人灵魂的罪恶。它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短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是革命现实主义的胜利。

(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历史发展时期,革命与反革命、前进与倒退、正确与错误始终进行着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历史已经证明,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必然的,社会主义是无敌的,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尤其是我们党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更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时代的心声。革命现实主义首先要求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鲜明地表现出这种政治倾向性,表现时代的主流,表现生活的真实。刘心武同志在《班主任》等六个短篇中,通过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通过对思想主题的开掘,体现时代精神,展示时代的发展趋势,从而赞美人民的力量,歌颂社会主义的光明。

作者笔下的徐懋珍,是在四害横行时社会主义正面力量的代表。她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执着不屈,坚持真理,敢于斗争。她毅然地向报社投递“申诉信”,坚持要把传授现代科技知识的“激光讲座”搞下去,她的这些行动,决不是偶然的,正是一位崇高的人民教师的精神品质必然产生出来的一种巨大的斗争力量,正如恩格斯所说:典型人物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致斐·拉萨尔)如果说,徐懋珍是在粉碎“四人帮”前,广大教育工作者同“四人帮”斗争的代表,那么《班主任》中的张俊石就是在粉碎“四人帮”后,为医治“四人帮”留下的创伤而战斗的典型形象。他同徐懋珍所处的环境不同,面临的问题也不同,他有他自己的独特个性:内蓄、多思,有勇气,有毅力,是一位知难而进,敢于变革现实的英雄形象。他从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生对同一本书《牛虻》有惊人相似的看法

中，深刻地看到“四人帮”向亿万青少年灵魂上泼去的无形污秽，从而激起他强烈的感情，发出了心灵的呼喊：“救救‘四人帮’坑害的孩子！”这不仅揭示了《班主任》深刻的主题，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而且使我们看到了张俊石丰富的内心世界。文艺作品中的人物描写，如果不能揭示本质，当然就没有真实可言。徐懋珍、张俊石形象的刻画，之所以使读者感到逼真、亲切，是因为他不仅集中概括了广大教育工作者共同特征，而且集中概括了广大人民群众仇恨“四人帮”，为祖国美好未来而勇敢地进行战斗的共同本质。徐懋珍、张俊石就是时代的英雄。

刘心武同志是比较注意人物内心刻划的。往往在情节的高潮，斗争的焦点，把人物思想的翻腾，内心的激荡描绘得细致入微。张俊石步入公园时，感情波涛的翻滚；徐懋珍站在讲台上，思想激流的汹涌，都是作者凤毛麟角之笔。它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心声，谱出了时代的强音，使我们看到了人物崇高的品德、高度的觉悟、深刻的见识。

值得重视的是作者还努力塑造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战斗的正面人物形象。《醒来吧，弟弟》中的卢书记和《爱情的位置》中的陆玉春、孟小羽，就是突出的代表。卢书记具有忠诚、刚毅、无私无畏的素质，作者把这位曾在文化大革命中无辜地被当着“走资派”揪斗过的老干部，置于粉碎“四人帮”后百废俱兴的特定环境和抓纲治国的伟大斗争之中，更充分地展现了他的精神品质和人格美。尽管他曾蒙受过不白之冤，但他却丝毫没有想到他自己，想的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和中国的繁荣富强，所以，他才能以极大的决心和毅力，“说真话”，“干真格儿的”。当然卢书记的形象还不够丰满，但这一形象的出现是十分可喜的。同卢书记相比，陆玉春、孟小羽是在党的阳光雨露下成长的年青一代。他们性格的特点是纯朴，对党、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深厚的感情。四害横行时，他们不满社会风气的败坏，自觉上车不坐座，并处处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去影响别人。他们战斗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但有共同的革命理想，这就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这样，烙火烧“冠军”陆玉春和革新能手孟小羽，互相倾慕，真诚相爱；互相鼓励，共同进步，为“实现祖国的‘四化’去拼命劳动、创造”就不是偶然的。爱情不仅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作者艺术地回答了长期以来，人们特别是青年十分关心而又不解的问题：在革命者生活中，爱情应该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青年又何止他们两个呢？作品以饱满的政治激情，歌颂这样生气勃勃的青年，正是体现着崇高的理想和时代的精神。

刘心武同志创造的这些人物，不是共同的政治轮廓，而是富有个性，心灵丰满的生动形象。作者不是按“四人帮”那种“三字经”的模式，把作品的先进人物、主人公写成“高大全”式的“英雄”，而是按生活的原样子，真实地描写这些人物，这也是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所在。张俊石、徐懋珍都是普通、平凡的中学教员，在四害横行时，不可能一下子“看透其中的奥秘”；粉碎“四人帮”后，对其流毒和影响，“或者没有觉察出来，或者没有象今天这样感到触目惊心”。但是，在惊心动魄的斗争中，他们看穿了“四人帮”的阴谋，认清了“四人帮”是令人震惊的社会现象的制造者，就“有了为真理而斗争的无穷勇气”。象孟小羽这样的青工，开始“心里象青云般飘荡不定”，对爱情缺乏正确看法是很自然的，她正是在老一代革命战士的熏陶教育下，懂得了什么是爱情和爱情的位置。总之，他们既有思想的发展，又有崇高的精神品质，是生活在我们中间的“这一个”，因此，具有

极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

(二)

革命是崇高的，同时革命也是痛苦的、无情的，它是阶级的搏斗，生死的决战，必然伴随着污秽和血。因此，革命现实主义要求作家要从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和历史、具体地描写现实，必然要大胆地表现生活的矛盾和斗争，正确地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无情地揭露黑暗，鞭笞罪恶。如果对现实生活中消极的、腐朽的、反动的东西，采取回避的态度，一味地歌颂升平，粉饰现实，这不仅违反了革命政治性，同样，也违反了生活真实。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革命任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长期以来，林彪、“四人帮”散布的反革命谬论，严重地腐蚀、毒害着人们，特别是年青一代的灵魂。倘说我们的文学作品不去揭露它，那么人们就看不到这一特定历史环境的真实生活面貌，就认识不到“四人帮”给人们灵魂的内伤的严重性，就不能使人们惊觉起来，奋力医治创伤。刘心武同志对大量的生活素材，加以提炼、概括，塑造出几个活龙活现的人物，形象地告诉人们，切切不可低估“四人帮”的危害。作者发出要“救救‘四人帮’坑害的孩子！”这种心灵的呼喊，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这正显示了革命现实主义艺术魔力，也是《班主任》等六个短篇受到读者普遍欢迎的重要原因所在。

宋宝琦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触目惊心的“畸形儿”。这样一个出身在劳动人民家庭的“五官端正”“体魄健壮”的孩子，却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完全是“四人帮”的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使他坠入了无知的深渊。它的艺术效果和社会意义只能是叫人吃惊，引人疗救。作者看到的还不仅仅是象宋宝琦这样一种容易被人注意的“罪犯”，而且紧紧抓住现实生活中，那些为数不少的相貌堂堂、毒入骨髓的“内伤者”，对他们受伤的灵魂进行大胆的触动，让人们看到一些更需要疗救的精神“畸形儿”。在塑造这类人物时，作者并没有简单地脸谱化，而是对生活中大量的原型进行了集中、概括。他们生活在我们周围，又是典型化了的艺术形象，因而不仅概括着深刻的社会内容，而且符合社会生活的特定的历史面貌和本质，正如别林斯基说的，文艺创作中的每一个典型，对于读者的感觉，是“一个熟识的陌生人”。这几个短篇中，写得最好的要数谢惠敏、亚梅和彭晓雷。

谢惠敏和亚梅的愚昧无知，庸俗愚钝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谢惠敏热衷的是搞极“左”，组织生活只能虔诚地念报上的“帮文”，而不能爬山；天再热只能穿长袖衬衣，不能穿短袖。她有一种“铁的逻辑”：图书馆不开放，报上不推荐的书一律都是黄书。无怪乎，她跟宋宝琦那样不谋而合地硬把《牛虻》说成是“黄书”。亚梅同谢惠敏相比，她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出这种扭曲的灵魂。一方面无知愚昧，根本不知道“爱情”为何物，只知道人世间有“搞对象”，“结婚登记”；另一方面，她庸俗市利，追求的是职位、工资、财富。她的逻辑很简单，谁的东西多就嫁给谁。这可笑吗？不，这是可怜而又可悲的事实，是他们真实的灵魂。但她们自己，却是那样自信的认为是“最革命”、“最讲实际”的，人们也很容易原谅她们。刘心武同志对他们灵魂披露的深刻现实意义在于：暴露了隐藏得很深的灵魂毒菌，掀开了罩在她们身上的“革命”彩纱，使人们认识到，为了祖国的未来，抢救、医治这样的青年是何等重要！在描写这些人物时，作者没有停留在这种变态丑恶

灵魂的刻划上，而是进一步指出了产生这种精神“畸形儿”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在学校，人类一切进步文化都被封禁，他们得不到应该得到的知识和力量；在家庭里，他们又没有可能受到正确的指导。中华民族一代纯正健康的青年，就被“四人帮”残害得如此愚昧、庸俗。这也形象地揭示了：“四人帮”是残杀祖国未来的罪魁祸首。

文艺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是现实生活在作者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人物个性的深度，充分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生活思考的深度，以及对现实中的人物研究的深度。《醒来吧！弟弟》中的彭晓雷，不是谢惠敏和亚梅的继续，而是新的开拓，是一个概括着丰富的社会内容的典型形象。他是一个心灵空虚，无所作为，看破“红尘”的青年，他扭曲的灵魂呈现的是另外一种状态，冷漠、空虚、超脱。他感到国家没有希望，自己没有前途，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完了。他心灵的青春火焰被“四人帮”的毒汁灭息了。他除应付上班以外，不是抱着吉他闷声闷气的哼着歌子，就是喝啤酒聊大天，看到抵制“四人帮”的先进事迹认为“没多大意思”，对坚持原则的朱瑞芹揭矛盾行动又“毫无兴趣”。尤其是，他还迟迟不愿投入到“红尘”中来，更不愿去做什么克丁克卯的质量检查员。作者在小说的结束，还寓意深长地让彭晓雷在街道上“踽踽独行”，在“红尘”的边缘上犹豫着，这就深刻地说明：要治愈这部分人受伤的心灵，恢复他们对真理的信仰，该是多么紧迫，多么崇高而艰巨的任务！这也就是这个形象所概括的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同志说：“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是人民大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刘心武同志正是通过对活生生人物灵魂的深刻揭露，心理的细致描绘，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看到“四人帮”给人们、特别是年青一代的内伤是何等惨重，遗留的恶劣影响何等顽固。它是社会的痼疽，前进的羁绊。作者以极大的勇气，富有战斗性地卷入到千百万人关心的社会问题上去，把灵魂的毒瘤揭出来，正是作者坚持真实反映现实生活和高度革命责任感的表现，这同所谓“暴露文学”是根本不相同的。

（三）

刘心武同志的《班主任》等六个短篇，触及的社会问题是严重的，揭露的黑暗面是深刻的。但是，它给人不是消极、低沉、压抑的感觉。相反，它却激人愤慨，鼓人斗志。这原因就在于作者紧紧把握住了革命现实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特质，不仅要深刻地反映现实的真实生活，揭示生活的本质和主流，同时还要饱和着革命的理想，预示着光明的未来。刘心武同志把自己对生活的深邃思考和革命理想，不是简单地放到一个硬加上去的“光明尾巴”上，而是完全熔铸在生动的艺术形象之中，读者透过典型环境下的典型性格的生动描写，看到时代的发展趋势，在眼前展现出一片光明，并激发起为真理而斗争的力量。这也是刘心武同志短篇小说一个很大的特色。

当然，作者塑造的张俊石等英雄人物，无疑是先进力量的代表，是时代发展趋势的体现，是最大的光明面。不仅如此，作者还在刻划那些“伤情”严重的人物的同时，描写了一些正面人物。尽管对这些人物着墨不多，但是作者赋予他们的健康、纯洁的品德和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却是鲜明的。《班主任》中的石红邀集同学读《表》的情节；《没有讲

完的课》中岳航给徐老师送粉笔盒的行动；《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中的刘丽云对“四人帮”的谴责和赵海焘苦钻数学的精神；以及《面对着祖国大地》中的李抗饱含激情的理想，尤跃辉做新长征中千里马的决心，无不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健康的青年身上闪耀着青春的火焰。他们是时代潮流的浪花；他们的行动、言谈、丰富的心理活动，构成斑斓多彩的生活图画，使作品呈现着清新健康的情调。

刘心武同志不仅注意了正面人物的描写，就是在描写那些受伤人物时，也把他们置身于时代潮流之中，预示着他们的转变。读了《班主任》，我们并不感到宋宝琦就是不可雕的朽木，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他的转机是不言而喻的。对于谢惠敏、亚梅和彭晓雷，作品没有明确写出他们的转变，但是，作者痛惜和切望的复杂感情，读者是完全能体察得到的。我们看到张老师要把《牛虻》留给谢惠敏，说服她去读读这本书；亚梅也提出了“你说说看，究竟什么是爱情？”的探求；正在徘徊的彭晓雷，时代已向他伸出了双臂，从这些描写里，读者是不难预见到他们受伤的心灵是一定能医治好的，以崭新的姿态投入到新长征的行列中去。尤其是，刘心武同志还为我们塑造了邹宇平这样一个形象，他由“张罗张罗自个儿”，变为“倾注着全部心力，学习技术，要为打扮咱们的祖国而努力，让祖国穿上现代化的服装”，这就有了更大的说服力。

“四人帮”一伙给我们带来的危害是灾难性的，我们的作家，以文艺创作为武器，参加这样一场斗争是责无旁贷的。刘心武同志通过短篇小说揭露“四人帮”罪恶及其流毒和影响时，给我们的启示是：和着时代跳动的脉搏，紧紧抓住时代的主要矛盾，针对现实生活中提出的主要问题，既要揭露其阴暗面，又要充分表现光明面；既要看到逆流和斗争的曲折复杂，又要反映主流和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样，就能真正反映出现实的真实，喊出人民的心声，发出时代的最强音，充分发挥文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有人说，这些作品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这是不对的。创作方法是作家运用形象思维认识生活、解释生活、反映生活的原则和方法，它一定要受世界观的指导和制约。我们判断一篇作品是不是革命现实主义的，主要不是看它写了什么，而在于它是不是站在党的立场、人民的立场，在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反映现实。在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要彻底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组织浩浩荡荡的大军进行新长征的今天，无疑，刘心武同志的作品是带有很大的批判性。但是，作者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充分地表现了社会主义光明面，积愤如仇地揭露“四人帮”的罪恶。作者所关心的问题，正是千百万人所想的问题；他通过自己的作品所作的回答，正是千百万人的心声，因此，这些作品不仅合着了时代的脉搏，也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是相联系的。真实地反映生活是革命现实主义的灵魂，“四人帮”鼓吹脱离生活，歪曲生活，在艺术上搞地地道道的反现实主义，刘心武同志有勇气，拨乱反正，挣脱“主题先行”，坚持从生活出发，不仅在新的历史时期，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反映了新的现实生活，而且在恢复和发扬被“四人帮”破坏、歪曲了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方面，作了极大的努力，因此，刘心武同志的创作道路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刘心武同志是“在新长征的文化队列中”涌现出来的“一员新兵”，我们相信，他将会永远深深扎根在生活的沃土中，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为我们这个瑰丽的时代增添光彩，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作出更大的贡献。